

2024年第15期新闻稿：外交使团馆舍不可侵犯



《无题》阿夫辛·皮尔哈舍米（伊朗）作于2017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虚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确定性已经坍塌，邪恶无孔不入。当然，还有加沙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加沙。自 10 月 7 日以来，已有 33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，7000 多人失踪（其中 5000 人为儿童）。以色列政府粗暴无视全球舆论的声讨。数十亿人对他们赤裸裸的暴力行径感到愤怒，但我们却无法迫使一支决定夷平整个民族的军队停火。全球北方国家政府都是说一套做一套：先是陈词滥调地表示关切，以缓解本国人民的沮丧情绪，然后又在联合国投否决票，并向以色列军队输送武器。正是这种两面派行为增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的信心，使他们得以逍遥法外。

正是这种有罪不罚纵容以色列违反《联合国宪章》（1945 年通过）和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（1961 年通过），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的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，炸死 16 人，其中包括伊朗高级军官。这种有罪不罚现象具有传染性，在那些因华盛顿的傲慢而自恃妄为的领导人中蔓延开来。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·诺沃亚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于 4 月 5 日派遣准军事部队硬闯位于基多的墨西哥驻厄大使馆，扣押了获得墨西哥当局政治庇护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豪尔赫·格拉斯。诺沃亚

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一样，无视国际社会尊重外交关系的悠久历史，漠视这种行动的危险影响。内塔尼亚胡和诺沃亚等领导人觉得他们可以逍遥法外，因为他们受到全球北方的庇护，而全球北方不管怎样都能逍遥法外。



《无题》（选自《我来自记忆深处》系列）露西亚·奇里博加（厄瓜多尔）作于1993年

外交惯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，跨越不同文化和大洲。公元前四世纪，中国的庄子与和他同时代的印度人考底利耶分别著书立说，论述国家之间通过使者建立体面关系的条款。这些条款几乎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，有证据表明，因冲突而订立的协议包括互派使者以维护和平。这些古代思想（包括罗马法）影响了欧洲早期的习惯国际法编纂者：胡果·格劳秀斯（1583—1645）、科内利斯·范·比恩克尔斯胡克（1673—1743）和埃默·德·瓦泰尔（1714—1767）。正是这种对外交礼节必要性的全球共识形成了外交豁免的概念。

1952年，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由联合国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（ILC）编纂外交关系法典。为协助国际法委员会开展工作，联合国任命曾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（1947年）的瑞典律师埃米尔·桑德斯托姆为特别报告员。在桑德斯托姆的协助下，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外交关系的条款，联合国81个会员国对这些条款进行了研究和修订。1961年，在维也纳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会议上，所有成员国都加入了《外交关系公约》。61个签署国中有厄瓜多尔、以色列和美国。因此，这三国都是1961年《维也纳公约》的创始缔约国。

《维也纳公约》第22条第1款规定：“使馆馆舍不得侵犯。接受国官吏非经使馆馆长许可，不得进入使馆馆舍。”



《梦想 77》萨夫万·达胡勒（叙利亚）作于2014年

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色列最近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**通报会**上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提醒同僚，25年前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导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。当时，美国总统比尔·克林顿为袭击**致歉**，称其为“孤立的悲剧事件”。以色列和厄瓜多尔都没有为其侵犯伊朗和墨西哥大使馆的行为道歉。耿爽在安理会表示：“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红线被一次次地突破。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被一次次地击穿。”在这次通报会上，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何塞·德拉加斯卡谴责了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袭击。他说：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类袭击**辩解**。”几天后，厄瓜多尔政府就违反了1961年《维也纳公约》和1954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《**外交庇护公约**》，闯入墨西哥大使馆逮捕了豪尔赫·格拉斯，这一行为迅速遭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**谴责**。

这种侵犯使馆庇护的行为并不新鲜。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为表达政治观点而袭击大使馆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其中包括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，53名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。但也有一些政府强行进入外国使馆馆舍的例子，如1985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派部队闯入荷兰大使馆**逮**

捕一名协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荷兰人，1989 年美国侵略军**搜查了**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的官邸。这些干预行动无一不受到制裁并要求道歉。然而，以色列和厄瓜多尔这两个《维也纳公约》的签署国都没有做出任何道歉姿态。伊朗和叙利亚未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外交关系，墨西哥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后与厄瓜多尔断绝了外交关系。



《墨西哥索诺拉沙漠里的女性天使》格拉西埃拉·伊图尔比德（墨西哥）作于1979 年

暴力像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横扫世界，不仅在加沙，而且向外蔓延到厄瓜多尔周围正在酝酿的冲突，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、苏丹和乌克兰持续僵持的丑恶战争。战争使人类精神崩溃，但也唤起了人们走上街头阻止扣动扳机的巨大本能。这种强烈的反战情绪一次又一次地直面怒火中烧的强权，强权逮捕和平缔造者并把他们而非军火商视为罪犯。



《伊朗最后的诗人》帕尔维兹·塔纳沃利（伊朗）作于1968年

伊朗有着光荣的诗歌传统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阿布阿卜杜罗·鲁达基（858—941），后因赫瓦贾·沙姆斯·丁·穆罕默德·哈菲兹·希拉齐（1320—1390）的诗作而发扬光大。他让我们有了这样的苦恼：“尘世中，没有人熠熠生辉；必须建立另一个世界，创造一个新亚当。”

加鲁斯·阿卜杜尔马利基安（生于1980年）继承了波斯语诗歌的这一传统，他的诗作充满了战争及其影响。但是，即使在枪林弹雨和坦克轰鸣中，他的诗作也蕴含着对和平与爱的强烈渴望，一如他的《静止之诗》（2020年）：

他用枪管搅茶
他用枪管解谜
他用枪管划动思绪

有时
他面对自己而坐
把子弹的记忆
从他的大脑中剔除

他参加过许多战争
却敌不过自己的绝望

这些白色药丸
让他面无血色
他的影子必须站起来
为他取水

我们应该接受
没有士兵
从战场上
活着回来

热忱的，

Vijay